

# 现代国外经济学 论文选

第十七辑

商务印书馆

5

#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七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XIÀNDÀI GUÓWÀI JINGJIXUÉ LUNWENXUǎN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七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86-6/F·204

---

1997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24千
印数 2 000册	印张 9 1/2

定价: 12.40元

## 编者前言

这一辑《论文选》选自1982年出版的《供给经济学：批判性的评价》一书。该书是一本论文集，编者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精选了1978—1981年期间有关供给学派的重要论文和著作节录27篇，分门别类地编为9章。在这里，我们择其要选译了其中的14篇。由郭熙保、冯金华和王诚德合译，刘精香统校，师秋明、蔡进和汤学义参加了部分校对。

《供给经济学：批判性的评价》一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该书的大部分作者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当代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所选论文具有一定权威性。作者中包括著名的肯普—罗斯减税法案的起草人；第一个向凯恩斯主义主流派发起供给学派进攻的保罗·罗伯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著名的拉弗曲线创始人阿瑟·拉弗；被誉为供给学派“圣经”的当代畅销书《财富与贫困》的作者乔治·吉尔德等。还有一些作者曾任里根政府高级官员或经济政策顾问。第二，该书对供给学派的评价比较客观。收集的论文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充分地代表西方当前各种经济思想流派(如供给学派、凯恩斯学派、激进学派、货币学派，新古典学派等)对供给经济学的各种观点。就是同一个学派也对供给学派理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第三，该书的目的是要帮助读者了解有关供给学派争论的全貌，因此，该书不是间接地通过供给学派批判者之间的论战来介述供给学派理论，而是让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与他们的批判者直接进行交锋。例如，作为供给学派重要论点的拉弗

曲线,既有拉弗本人的阐述和辩护,同时也有别人对拉弗曲线的评论和批判。所以,该书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供给学派理论要点和争论的实质。

供给学派的基本思想出现于70年代初,到了70年代末,由于凯恩斯主义失灵,这一思想和者甚多,最后被冠以“供给学派经济学”或“供给经济学”,它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是直接对立的。

供给学派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供给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作为一个学派,他们的基本观点必然是一致的。这些观点可以概述如下:

1. 供给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是供给学派的最基本的观点。乔治·吉尔德在《供给学派》一文中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就是:“资本主义财富之源是经济的供给。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简单的认识是一切成功经济政策的核心。”据此,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把70年代的滞胀局面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不会增加就业和产出,因为它侵蚀了储蓄,抑制了投资。但扩大财政赤字支出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涨,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因此,滞胀的根源就在于忽视了供给而强调需求。

供给学派关于供给是财富之源的观点只是老调重弹。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毫不掩饰地承认他们是重新强调30年代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强调的真理、即“供给自创需求”这一萨伊定律。有人认为,既然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律,可以称之为“凯恩斯革命”,那么,供给学派否定了“需求创造供给”的凯恩斯定律,因而也可以称它为“供给学派革命”。其实,如果说凯恩斯以他的有效需求理论取代古典经济学算是一种“革命”的话,那么,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的重新肯定就完全没有“革命”的味道了。因为前者毕竟是一种新的理论,而后者只不过是经济学说中一种返祖现象或复古行为。

2. 刺激是增加供给的决定因素。既然供给是经济增长之源，那么，怎样增加供给呢？供给学派认为，产出是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直接结果，因此，增加生产和供给唯有增加投资和劳动，尤其是投资。投资是储蓄的转化，因此，产出的增长又决定于储蓄的多少。供给学派把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储蓄率低，而低储蓄率是由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

除了储蓄之外，企业家精神也被认为是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吉尔德指出：“任何经济制度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主要源泉是单个的投资者。经济不会自动地或依靠政府影响增长。经济增长反映人们甘愿冒险，把思想变成垄断，把垄断变成工业，以及先给后取的进取精神的增长。”

供给决定于要素投入，而要素投入由什么决定呢？供给学派的观点是，构成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和企业。这些经济主体根据外界的各种刺激来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拉弗说：“人们随着刺激的变更而改变行动。如果增强某项活动的吸引力，人们将会更多地从事该项活动。如果减弱某项活动的吸引力，人们将会较少地从事该项活动。”因此，促进生产要素的积极投入和努力就应该着眼于对人们经济活动的刺激，供给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刺激因素及其作用和怎样进行刺激以取得最大效果。

3. 减税是增加刺激的最有效手段。这里所说的减税是税率的降低，尤其是边际税率的降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增加刺激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降低税率。供给学派的创始人保罗·罗伯茨在《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破产》这篇批判论文中，详细地论证了高税率尤其高边际税率对经济的危害性。高税率抑制了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挫伤了储蓄者和投资者的储蓄和投资积极性。他同时论证了低税率对经济的益处。他指出，降低税率一方面能够刺激工作积极性，人们愿意多工作，因为它使闲暇成本提高了；另一

方面，能够鼓励人们多储蓄和多投资，因为当前消费的成本提高了。

4. 减少政府干预是增加刺激的重要保证。作为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的反对派，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首先，反对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供给学派认为，巨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助长了浪费和舞弊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促进了懒惰，扩大了贫困。其次，反对过多的规章法令。按照供给学派的说法，企业自主经营是经济进步的重要条件。政府过多的、不适当的管制则会阻碍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第三，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主张实行金本位制。供给经济学家争辩说，通货膨胀是造成经济停滞的根源之一，而通货膨胀又是货币发行过多所致。因此，他们建议恢复金本位制，它可以控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权力。

80年代初，由于美国滞胀问题严重，凯恩斯主义者一筹莫展，美国统治集团急于寻找一种新的理论和政策来取代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理论和主张正中下怀。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伊始，就宣布把供给学派理论作为他政府的政策基础。1981年初，里根向国会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减税。这样，发源于70年代美国的供给经济学，在80年代初就爬上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

供给经济学在美国的实验结果如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经济确实摆脱了滞胀的困境，经济开始增长，通货膨胀很低，失业率也有较大幅度下降。这些成绩似乎证实了供给学派理论的有效性。为此，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但是，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不同意见。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奇莫林和理查德·杨在1986年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与许多供给经济学家所作的预测相反，减税并没有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商品或最终产品供给的增加产生于较

低的边际税率；或者，由于总供给曲线的变动，减税是降低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还指出：“经济复苏比早期预计的快主要是由于闲置资源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重新就业，而不是较为有利的长期增长展望。”

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因为它以荒谬的、实际上不存在的萨伊定律作为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的错误早已被马克思深刻地批判过。

萨伊定律的经典表述是：供给创造它自身的需求。这个定律是完全错误的。首先，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如果一个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他的产品供给就没有创造对别人产品的需求。其次，即使这个生产者的产品符合社会需要，交换了货币，但他也可能不会马上购买别人的产品，而是把钱储蓄起来。这样，他的产品供给也不会形成对其它产品的需求。由此可见，要想使供给创造需求，就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第一个条件常常是不具备的。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矛盾引出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人民群众消费能力日益相对缩小，使得生产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第二个条件也常常不成立。人们得到收入往往不全部支付出去，而是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由于种种原因，储蓄不可能全部转化为投资，特别是在萧条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是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而是供给创造自身的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发生就是对萨伊定律最有力的批判。

现代供给学派试图复活萨伊定律，用增加供给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困境，这是不可能的。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虽然摆脱了滞胀局面，但仍然非常脆弱，它以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支撑着。不久会有一天，美国经济将会陷于更深的危机之中。



而且,我们认为,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主要是受经济周期的规律支配,而不是由减税措施带来的。

供给学派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市场自由调节,这一观点同样是对历史的反动。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回到自由资本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倒转。在现今世界上,生产和经济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国际经济关系日趋紧密,单个私人生产者不可能解决这些复杂关系。因此,客观形势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只有国家干预,才能保持经济稳定和减缓经济大的波动。

供给学派提出的全面减税和削减福利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政策。减税的利益主要由富人获得,而削减福利开支使穷人更加贫穷。这种政策的后果必然造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最终导致更严重的困境。

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虽然是错误的,但某些观点还是富有启发性。例如,供给作为经济增长之源的观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特别有意义。在前几年,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照搬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鼓吹高消费高投资,试图以此带动经济发展。实践证明,这种需求导向的经济政策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必须把供给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 目 录

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破产.....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	( 1 )
供给学派.....	乔治·吉尔德	( 16 )
税收变化的经济效果：新古典学派的分析		
.....	诺曼·图尔	( 38 )
供给学派的需求 .....	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	( 77 )
供给学派的弱点：奥地利学派的批判		
.....	托马斯·W.黑兹利特	( 92 )
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对一个复活观点的		
历史分析.....	罗伯特·E.凯莱赫 威廉·P.奥泽乔斯基	( 125 )
萨伊定律与凯恩斯经济学.....	泰勒·考恩	( 162 )
政府苛税和岁入不足.....	阿瑟·拉弗	( 189 )
评拉弗模型.....	马克斯·莫斯泽	( 208 )
经济的供给方面：沃顿模型的看法		
.....	劳伦斯·R.克莱因	( 228 )
有关供给学派税收政策的证据 .....	罗伯特·E.凯莱赫	( 236 )
储蓄是供给经济学的关键：一项建议.....	斯坦利·凯什	( 248 )
供给经济学的货币方面 .....	威廉·P.奥泽乔斯基	( 260 )
货币主义和供给经济学能共存吗？ .....	曼纽尔·约翰逊	( 275 )
译名对照表.....		( 288 )

# 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破产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

近来，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议论纷纷。这种危机的存在明显地表现在我们经济政策制订者面对经济现实暴露出来的窘迫和无能上。但是，这次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症结何在，怎样才能予以解决呢？

我认为答案几乎出奇地简单。美国今天的公共经济政策的制订完全忽视了经济所依赖的人的刺激因素；相反，其政策之制定是以凯恩斯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仅由经济总需求或总支出水平来决定。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被视为支出不足的表现。最好的补救办法就是政府通过预算赤字增加总支出；然后，据信，国民生产总值将会数倍于支出增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重点集中在对“支出差额”和“乘数”的估计上，以便能计算出所需的赤字。

这个经济政策观点被体现在大规模经济计量预测模型之中——国会和行政部门都依赖这些模型对经济政策选择方案进行模拟。这个观点的离奇就在于强调支出。确实很明显，如果人们不购买，就没有人为市场生产。似乎也很明显，人们购买得越多，生产的产品就越多，因此，以增加总需求为目的的政府财政政策的运用，将会增加总产量或国民生产总值。所有这一切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是这样一目了然，以致于他们相信任何导致政府支出增加的财政政策——甚至支出伴随着税收一同增加——都将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

“平衡预算乘数”概念表明凯恩斯主义者把支出作为生产的决定因素而放在首位。按照这个概念，政府能够通过提高税收和支出岁入来增加总支出，从而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其推论如下：人们并不只是通过减少他们的支出(消费)来缴纳更高的税收；他们还减少自己的储蓄。因此，当税收增加时，私人支出的减少就低于政府支出的增加；相反，税率的削减——政府支出也相应地减少——就会导致总支出的减少(即储蓄将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以及失业的提高。

在1964年总统选举以后数年中，大学生们在经济学考试中要回答一个标准考题：如果巴里·戈德华特减税(支出相应削减)的方案被实行了，其结果如何？如果考生不回答总需求将减少，从而，国民生产总值和失业将下降，那他们就答错了。对众多的政策制定者来讲这仍然是答案。

既然“平衡预算乘数”意指税收和政府支出增加得越大，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得也越大，那么，奇怪的是没有人曾经询问，当税率提高时，生产会出现什么局面。这个问题使经济政策面临着向来被忽视的刺激作用。当边际税率提高时，人们宁愿增加闲暇而不愿增加当前收入，宁愿增加当前消费，而不愿增加未来收入——这一点甚至对凯恩斯主义者来说，也应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总需求增加多大，只要工作努力和投资下降，生产就将下降。对抑制作用的这种领悟就意味着对刺激作用的领悟。所以，凯恩斯主义者不得不逐步地重新考虑他们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标准问题的答案。一旦有人认识到人们是为获得收入进行生产和投资，而收入取决于税率，那么，这个人就懂得了财政政策不但引起需求方面的变化，而且引起供给方面的变化。

## 供给经济学

支出经济学完全忽视了供给经济学。在供给方面有两种支配生产的重要相对价格：一种价格决定增加当前收入和增加当前闲暇之间的选择，另一种决定增加未来收入（投资）和增加当前消费之间的选择。两种价格都受到边际税率的影响。所得税率越高，按照放弃的税后收入计算，闲暇和当前消费的成本就越低。

作为一个例子考虑一下生产的决定。有两种时间用途——工作和闲暇。每种用途都有一个与另一用途相应的价格。额外闲暇的价格就是由于不工作而放弃的收入量，它受税率的影响。税率越高，享受额外闲暇而放弃的税后收入量就越小。换言之，税率越高，闲暇的相对价格越低。当边际税率达到百分之百时，额外闲暇的相对价格就变为零。在那一点，额外的闲暇变为自由品，因为不必作出任何牺牲就可以获得它。

我们常常听说一个人一年的头5个月为政府工作，然后开始为他自己工作。但是恰恰相反，上半年，他为自己工作；只是当他的收入达到应税水平时，他才开始为政府工作。他挣得收入越多，他为政府工作得就越多，直到上升的边际税率阻止他进一步工作为止。

以一个医生的情况为例，他在工作6个月，8个月或10个月后就遇到50%的税率。他面临着工作另外6个月、4个月或2个月而只获得50%收入的局面。工作努力所换来的如此微薄的税后收益就促使医生分摊开业，减少工作时间而延长休假。这样，高税率由于阻止他们获得增加的应税收入而缩小了税基。高税率还由于减少医疗服务供给提高了就诊费用。一种税率的下降将会提高闲暇的相对价格，产生更多的应税收入，还产生更大的医疗服务供给。

税率对获取额外应税收入的决定的影响不只限于医生或高税

收等级，它影响涉及一系列的税收等级。马丁·费尔德斯坦研究表明，普通工人的税率实际上使他的税后实得工资与他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获得的不纳税的失业救济金之间的差额消失了。在这种情形下，30%的边际税率（包括州和联邦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使闲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如此之甚，使得不愿意工作而引起的失业率提高了1.25%；由于100万工人不从事生产，国民生产总值和税基也减少了。

再举一个有用的例子来说明：因为阻止人们获得额外的应税收入，不只是最高边际税率使国民生产总值，就业、税收遭受损失。蓝领工人迄今尚未面临最高边际税率（尽管在通货膨胀继续使货币收入提高，税率结构对通货膨胀仍不加以调整，也要不了多年他们就会达到这个税率）。然而，很多蓝领工人已经面临的边际税率就高到足以阻止他们获得额外的应税收入。以一个只面临25%的边际税率的木工为例。每获得额外未税收入100元，他实得75元。假设他的房子需要粉刷，他可以雇佣一个粉刷工，每天报酬80元；他自己外出工作一天获100元。但是，因为他的税后收入只有75元，所以由自己粉刷房子就节约5元。这样他决定不挣额外的100元是合算的。在这种情形下，税基减少了180元——其中100元是木工放弃的收入，80元是未被雇佣的粉刷工损失的收入（而且，与劳动分工相联系的生产效率丧失了）。

反过来，假设木工获得的额外收入的边际税率下降到15%。在这种情形下，他的税后收入就是85元，因此他雇佣粉刷工是合算的。这样，边际税率的下降就会扩大税基180元。

加里·贝克尔的研究清楚地表明通过非市场活动生产效用的资本和劳动由家庭使用（如木工粉刷自己的房子）。用这种方式生产的效用不用受税收制约的收入购买。因此，提供给市场的家有劳动与资本的数量将受到边际税率的影响。把增加的劳动与资本

提供给市场而获得的税后收入越低，增加的收入所能提供的效用就越小，这样家庭通过把他们的生产资源分配给非市场活动会增加它们的效用就越有可能。新家庭经济学的一个明确的意义就是：提供给市场的劳动与资本量受边际税率影响。

现在，考虑一个相对价格如何影响关于收入用途的选择问题。收入有两种用途——消费和储蓄(投资)，每种用途都有一个按另一种用途表示的价格。增加当前消费的价格就是由于享受增加的当前消费而放弃的未来收入量。税率越高，由享受当前增加的消费而放弃的税后收入量就越小；换言之，税率越高，当前消费的相对价格越低。

以一个面临对投资收入征收 98% 的边际税率的英国人为例。他选择以 17% 利率储蓄 5 万元，每年获得税前收入 8500 元；或者选择购买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因为每年增加的 8500 元收入的税后价值只有 170 元，所以增加消费的价格是非常低的，他只放弃每年 170 元的增加收入就能享受到一辆高级轿车。这就是今天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到处可见的原因。这么多的高级轿车被误认为是繁荣的象征。而实际上，它们是对投资收入征收高税率的表现。

税率的下降相对于未来收入而言提高了当前消费的价格，从而，吸引更多的储蓄，使实际投资的增长成为可能。税率的下降不仅增加可支配收入和总支出，而且，它还改变总支出的结构使之偏向更多的投资。这样，劳动生产率、就业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就会提高到假如把同量总支出更多地用于当前消费而有可能产生的水平之上。

### 减税与回扣

政府赖以对政策选择方案进行模拟的经济计量模型，不考虑

这些相对价格变化对国民生产总值供给方面的影响。考虑一下想要“把经济进一步推向前进”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制订者所面临的选择方案。他的目标是要增加总需求或总支出。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在平衡预算乘数（即税收和政府支出都增加）和赤字中间进行选择。他愿意放弃平衡预算乘数，因为它比较软弱；而赤字在政治上比立法产生的高税率更能为人接受。在决定了赤字后，他必须选择产生赤字的办法。他能够保持税收不变，增加政府支出，或他能够保持政府支出不变，削减税收。在后一情形下，他在回扣与长期减税之间有一个选择。为了想要他的赤字发挥最大的刺激作用，他决定求助于有关三种政策选择方案的经济计量模拟：税收回扣，税率减少，或者政府支出项目增加。

完全以凯恩斯主义的假定为基础的模拟表明：减少一定量的税收——不论是以个人所得税的回扣形式，还是以个人所得税率减少的形式——将会增加同量的可支配收入并从而增加同量的支出，并增加同量的国民生产总值。政策制订者可能为“灵活”起见而宁愿实行回扣。支出刺激可能在下一年并不需要；即使需要，他也有提供刺激的选择：或者通过别的回扣，或者通过政府支出计划的增加。但是，在经济计量模拟基础上，他对回扣或减税之间选择并不看得很重要。至于他的第三种选择——政府支出计划的增加，这个模拟可能表明美元交换美元，政府购买（与转移支付相对）的增加将会对国民生产总值影响更大，因为政府会花掉所有的钱，而如果把这些钱归还给消费者，他们就会储蓄一部分。根据他的选择方案的经济计量模拟，他作出结论说，没有什么令人非信不可的经济原因使人偏向三种选择方案的任何一种，他将根据政治原因作出自己的选择。

但是，经济计量模型已经把政策制订者引入歧途。不像个人所得税率减少那样，回扣毫不影响个人的边际选择，它不改变支配



选择(即额外当前收入和额外闲暇之间的选择,或额外未来收入和额外当前消费之间的选择)的相对价格。它不提高闲暇和当前消费的相对价格。因此,回扣既不直接刺激工作,也不直接刺激投资。对于任何一定的税收收入减少来说,回扣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不可能像税率减少所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那样大,因为它不影响促使人们安排更多的时间和收入来增加市场生产的选择。

政府支出的增加比较起来其处境不会更好,可能更坏。它同样不能提高工作和投资的税后报酬,而且,它增加了总资源中用于政府部门所占的百分比。如果政府部门使用资源在效率上低于私人部门(这个假设似乎成立),结果就是降低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比不增加政府支出时要小。但是,政策制订者选择方案的经济计量模拟对这些相对价格变化的刺激和抑制效应一概置之不理,而把重点集中在这些选择方案对可支配收入和支出的影响上。

过分地重视支出有很多有害的后果。一种后果是这些模型夸大了减税所造成的净税收损失。对这些模型所考虑的税基和税收的唯一反馈效应是与需求增长相应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些模型没有考虑到从工作和投资的较高税后收入中产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大。供给方面的“反馈效应”被忽视了。同样,从税率提高中获得的税收被估计过高,因为抑制效应被忽略了。

第二种后果来自把税收回扣当作与减税是一回事的流行误解;以及把回扣与减税看作是政策制订者的同样政策工具的不同形式这样一种类似错误倾向。如果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个人消费是永久收入的函数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短期回扣甚至对支出也很少发生影响。这样,根据回扣的经验,减税本身可能被认为是相对无效的,结果这就为政府支出计划的支持者留下了一个